

名家学术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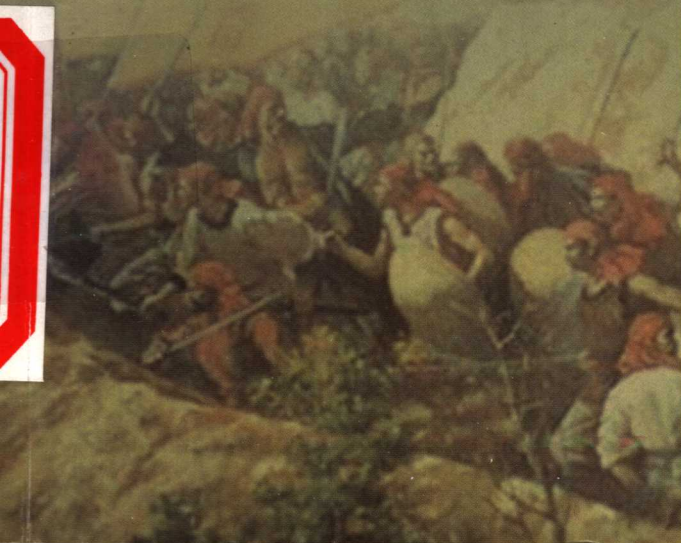
◎ 董楚平 著

农民战争与 平均主义



历史大转折时期的一次思想碰撞
关于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的讨论

方志出版社



农民战争与 平均主义

◎ 董楚平 著

□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董楚平著.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4
ISBN 7-80122-939-8

I. 农… II. 董… III. ①农民战争—中国—古代—文集②农民—平等观—中国—古代—文集 IV. K2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751 号

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

著 者:董楚平
责任编辑:李晓轻

出版发行: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12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fzph.org>
邮箱 zbsh@fzph.org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萧山日报印刷厂

开 本:1000×1400 毫米 1/32 开
印 张:7.5
字 数:274 千字
版 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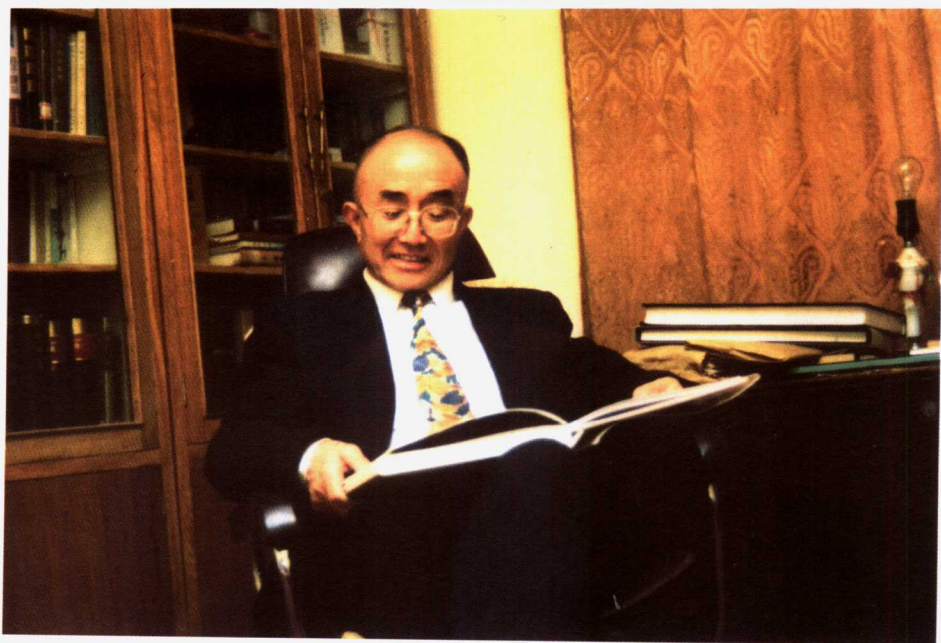
ISBN 7-80122-939-8/K·534

定价:3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1976年9月摄于温州郊区下垟街，从此开始研究农民战争，为拨乱反正作准备。
(王璞摄)



1992年初夏摄于杭州朝晖书房，时在撰写《吴越徐舒金文集释》。
(董引春摄)



2002年春，与妻合影于杭州桂花城女儿家，时在研究中国神话。
(卢慧平摄)

多情自古伤别离

——自序

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伏尔泰

每个婴儿降生时,对世界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啼哭,而我降生时连这点反应都不会。医生看了都束手无策,家里大人把我放在脚盆里,移到房间外,准备晚上扔到山里去。幸好我家开了一爿小酒店,黄昏时节,有个卖草药的江湖郎中来喝酒,看我奶奶眼眶里滚着泪珠。他问明原因后,就自告奋勇上楼动起“手术”来。他的“手术刀”只是一枚针,这枚未经消毒的小针,往我的手指弯上轻轻地挑了几下,我就哭了起来,居然还活到今天:虚龄 69 岁。“古稀”的生命高峰也已伸手可及。

每个舞文弄墨的人,出书时总是乐呵呵的。但我这本论文集的即将出版,并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笑意,校对时心头一片冰凉,像是与一位青梅竹马的女友永别似的。

该哭不哭,该笑不笑,我的命怎么会这样怪戾!

解放前夕,我在玉环县坎门小学读书。校长张人勋、教导主任杨谟、班主任陈道生、叶木兴等老师都是地下党员,《长征诗》、《沁园春》曾作语文教材,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背诵。在这里,我之所以要写出这些小学教师的名字,一因他们对我影响极大,使我在少年时代就接受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二因他们解放后生活都不愉快,有两位英年谢世,我对他们怀有按捺不住的纪念冲动。

由于健康原因,我小学毕业后没有马上去考初中,而是再读一个学期。这次重读使我又遇上一位好老师,这就是现为北京商务印书馆资深编审、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研究专家郭一民先生。郭老师毕业于西南联大,于 1947 年下半年回家探亲,在家乡教了半年书。他的语文课也不用国家规定的课本,而是自编讲义,选了鲁迅、冰心、胡

适、徐志摩、闻一多等名家名篇，还自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英国作家哈代的诗与小说等作教材，他的语文课使我视野大开，文学兴趣大增。

那个学期，我是旁听生，功课压力很轻，作业可以不交，故有时间去啃文学名著与理论著作。屠格涅夫的几部主要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爱》，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都是那个学期浏览掉的。我发现课外的世界比课内精彩得多，从此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即不重视正课学习，偏爱课外阅读，主要精力用于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東西。这使我后来中学阶段的成绩单一直不好看。这样做也有一个好处，锻炼了自学能力。

1948年春，我以第八名考入浙江省立温州中学（今温一中），过了一年，却有好几门功课不及格。因为我如饥似渴、废食忘寝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密密麻麻地摘了十几本笔记，还要参加一连串的学生运动，以致把功课都荒废掉了。

我少年时代最佩服两个人：马克思与毛泽东。因为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毛泽东为中国革命闯出一条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孙中山说，人的一生总得干成一件大事（大意）。我是文弱书生，干不了大事，但从小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立志要像马克思、毛泽东那样，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发现一条规律。于是找啊找啊，就决定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我发表于《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的那篇处女作（本书第18篇），就属这个“课题”，后来研究农民战争也属这个“课题”范围。

解放初，我配合家乡政府先后做了将近一年的社会工作，后来转入玉环中学（今楚门中学）、温州师范学校读书，1955年1月从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工作。在我二十多年中学历史教学生涯中，农民战争问题始终使我困惑、痛苦。当我在课堂上眉飞色舞地向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撒谎时，我的良心在滴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井喷”出来的十多篇拙文，是我二十多年痛苦思索的结果，是血与泪的结晶。

温州师范学校藏书丰富，师资力量雄厚。著名的美术史专家王伯敏教授、著名的戏曲史专家徐朔方教授，当时都在温师任教，都是我的老师。图书馆管理员黄庆洲老师对我格外照顾，允许我进入书库，星期日也可以在里面泡一天^①。由于有这么多书与这么好的老师，我最后一个学年开始练习撰写论文，有一篇关于中国封建制度特殊

^① 两年前，我写过一首怀念温师生活的七绝：“溯初亭上雨如丝，润物无声草木知，柳比西湖无逊色，校同精舍有良师。”“溯初亭”是温师校园的主要景点；“精舍”指杭州的诂经精舍。

性的文章,曾寄给《光明日报》,但被退了回来。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后来都写在本书第三篇第三节里。那节文字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的基本观点,李文治、胡如雷等学者都已作过深刻研究,我并无什么创见。只在这种特点与农民战争的关系方面似乎还略有新意。有的学者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超稳定”,其实完全说反了。如果从稳定与否的角度来谈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与其说是“超稳定”,不如说是“超动荡”。至于说经历二千多年许多次改朝换代,仍然未能走出封建阶段,那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缘故。生产力之所以积累不起来,原因之一就在“超动荡”,而不是“超稳定”。1979年我写本书第三篇文章时,“超稳定”理论还没有出来,故未涉及,这里也只能如此简单地补说几句。

1955年秋季,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即今浙江大学历史系)有一个保送生名额给温州市教育局,温州市教育局把这个名额给我,希望我进入高校继续深造。我因天性自由散漫,不愿再过拘束的学生生活,故予婉言谢绝,选择自学道路。人们对我的抉择都感到奇怪,我当时却毫不犹豫。

1956年秋,夏鼐先生在参加国际历史学家会议之后,回家乡温州休假一月。我带着《历史研究》的论文抽印本到他家拜访。夏先生平易近人,与我攀谈了一个晚上,师母始终在场。我读初中时的历史教师王祥弟老师是夏先生的清华同学,二人情谊甚深。他曾建议夏先生把我“带出去”,但我当时对考古学没有兴趣,我拜访他是出于对名人的敬仰,向他“取经”,并想了解史学界的一些情况。我与这位考古学大师就这样匆匆地擦肩而过。想不到三十年以后,我竟然对考古学产生浓厚兴趣,五十多岁才开始苦苦地自学考古,但只能纸上谈兵,无法取得实践经验。在我涉及的学科里,考古学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很多,收获最少。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要研究史前与先秦的历史文化,非学考古不可,只恨学得太晚。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机会,少数人善于抓住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多数人则将机会交臂失之,抱恨终生。我属于多数的“失落群体”。

1955年冬,我把一篇文章寄给邓拓同志,后由《人民日报》政治与理论宣传部转给《历史研究》,“并建议他们发表”,《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发表了这篇文章,即本书第18篇。1957年夏,我被戴上右派帽子,很多朋友都以为是这篇文章闯的祸,因为那篇文章说斯大林一段话“不是完全精确”。其实,我的右派帽子与那篇文章没有丝毫关系。当时还不像“文革”时期那么左,还有点学术民主。说来好笑,我当右派是太左、太“紧跟”的缘故。早在“乌云乱翻”期间,我就写了一篇批评钟惦棐《电影锣鼓》的小文。反右一开始,我就一口气写了好几篇“反击右派”的小品文,登在《温州日报》

上。但是我的反右派文章很快就被温州市委宣传部卡住了,因为他们收到《文汇报》退来的我于反右前夕几天写的三篇讽刺官僚主义的小品文。我写那几篇小品文,完全是为了紧跟毛主席,因为毛主席表扬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动员大家向官僚主义开火。我在温州听了传达报告后,当晚就响应号召,结果,就是这几篇来不及发表的“紧跟”文章,葬送了我的青春年华。有人说,我当右派是活该,右派就应该让我这种人来当。其实,“活该”的右派当时不在少数。

从此以后,我开始 20 多年的农村生活,学术兴趣渐渐转向楚辞老庄。直到 1976 年 9 月上旬,我预见到“四人帮”即将垮台,中国必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我放下楚辞老庄,开始研究农民战争,为拨乱反正作准备。

1979 年春,我写了一篇一万二千字的冗文《关于农民战争问题的几点新认识》,寄给《光明日报》史学副刊。文章分五个部分:一、几点质疑;二、暴力万能与“让步政策”;三、平均主义;四、农民战争的性质与成败;五、朱元璋及其它。除了“让步政策”之外,其它问题都在本书第一、二、三篇文章里写到了。当时的史学副刊主编是苏双碧同志,责任编辑是陈清泉同志。陈清泉同志把稿子退回给我;并用漂亮的毛笔字写了一封长信,约我集中谈一个问题:“历史发展的动力”。我遵嘱写了《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寄给他。1979 年 10 月 23 日,《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开辟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专栏,拙稿扮演了这场历时半年的学术大讨论的发难者角色。在这篇稿子里,凝聚着陈清泉同志不少心血。我写这篇稿子时,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半年多,初春解冻,乍暖又寒。我既思想解放,又心有余悸;已有新观点,但又未剪断与旧观点之间的脐带。文中有些句子就是这种复杂思想的反映。例如倒数第二段开头说:“封建帝王当然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第一句与“但是”以下所言是矛盾的,是为了避“美化封建帝王”之嫌而添画的蛇脚。文章发表后,很多朋友、读者都对这句话提出批评,有的还能看出我的苦心。

1979 年秋,我差不多同时写了两篇稿子,这就是本书的第二篇与第三篇,第二篇着重谈平均主义问题,第三篇全面阐述自己对农民战争的看法。

这第二篇是我一生写得最畅快的论文。文章的观点与内容早经反复酝酿斟酌,腹稿早已形成,写成文章只是一昼夜之事。初秋某日,我买了一斤三角一分钱的老酒,咕噜咕噜一口气就喝了下去。于是乘兴命笔,开了一个通宵;窗外皓月当空,似在陪我挥毫;东方发白,一篇万余字的论文出来了;兴犹未尽,口占《自嘲》一首:

天涯海角一村夫，^① 率性文章率性涂。

墨醉犹嫌天地窄， 酒狂岂令月轮孤？^②

此文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后，影响比第一篇还要大，“毁”与“誉”都更加强烈。一方面我收到各地来信200多封，写信人有教授（兰州大学赵俪生、浙师大孙正容二位老师）、机关干部、教师、学生、插队青年等等，他们的支持与鼓励，感人心肺，催人泪下，我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墨宝。一位当时的大学历史系学生，现在还回忆道：

那是一段最少禁忌、蓬勃自由的校园生活。同学们的思想被一篇又一篇史学文章所“解放”。1980年第1期《历史研究》上的董楚平和王致中的文章把这种解放推向高潮。我至今还记得我是怎样被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前者激动得热血沸腾。^③以往都说，尤其是老师在课堂上刚说，农民战争后建立的新王朝是这种战争失败的标志，现在董先生却说这是农民战争成功的标志，这是何等鞭辟入里，痛快淋漓！^④

但是另一方面，来自农民战争史学界的猛烈围攻，却使我目瞪口呆，始料不及。我当时十分纳闷：我写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与中国历史的普通常识，一般读者读了都欢欣鼓舞，那些专家教授怎么反而理解不了呢？这使我想起《皇帝新衣》与《曾参杀人》，始信谎言说多了也会成为“真理”，甚至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只有“不懂事”的儿童，才敢说皇帝裸体。满腹经纶的圣贤们反而较难承认事实，因为他们脑子里的“本本”太多，在他们看来，“本本”比事实更重要。举一个例子吧。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课本都说，《天朝田亩制度》反映当时农民的愿望，得到农民的拥护，把太平天国革命推向高潮。这是中国人民倒背如流的历史常识，其实却是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的大谎话（详见本书第11篇）。去年，中央电视台放映大型历史连续剧《太平天国》，仍在不厌其烦地宣传这个谎话。应该承认，电视剧《太平天国》已有一些改革，但基本上还贯穿着史学界长期以来的正统观点，结果遭到广大观众的唾弃，创下中央电视台大型连续剧收视率的最低纪录（详见本书附录第6篇）。学者与群众的反差何其大也！

再举一个例子吧。本书第一篇的第一个问题“惟一动力论质疑”，是上世纪五十

① 我当时还在温州郊区永强中学当教师，永强地处海隅，故云。

② 李白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③ 原注：“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④ 王学典：《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学术界》2002年第1期，第239页。

年代一个初二学生暗地里向我提出的。他的问题好比当头棒喝,使我猛地清醒过来,开始怀疑我们的农民战争理论。这个敢说皇帝裸体的“无知”儿童,是我研究农民战争的启蒙老师。

在其它学术领域里,也存在“皇帝新衣”、“曾参杀人”的怪现象,即长期奉谎言为真理。例如中国古代的“天圆地方”说,违背人类对天地的直接感受,连儿童都能看出它的破绽,但是因为它是儒家的祖传谎言,竟能把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蒙蔽了二千多年之久。^①

再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是小学生都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而且是毛泽东《实践论》的核心思想。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思潮与教条主义的泛滥,却被理论界视为异端邪说,成为禁区。更可笑的是,禁区的卫士们是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精髓的。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党中央的引导学习,恐怕至今还会像农战史问题一样,是一个准禁区。如此看来,一般群众有时比教条主义的学者聪明得多,冬烘先生观察思考的能力往往不如三尺童子。

《历史研究》不仅发表我的文章,还邀请我到北京住了一个月。他们为我联系安排在鼓楼西大街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居住,使我平生第一次与藏族同胞共同生活了一个月,真有意思!阔别23年的郭一民老师来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与西藏驻京办事处找我,热情奔放的师母在家里设盛宴为我洗尘。我认识拜访了丁伟志、庞朴、王庆成、顾诚等令人尊敬的学者;游览了名胜古迹,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两次进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历史文物。我当时还是温州郊区永强中学教师,数十年的井底之蛙,突然跳到井沿上来,大开眼界,大长知识。这是学术刊物对一个特殊作者的特殊栽培,他们因此招徕非议,承受压力,我至今既感激又不安。当时负责具体接待的是责任编辑田居俭同志,他为我花了不少心力。主编黎澍同志单独与我谈过话,这位革命前辈是当时社会科学界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他的谆谆教导,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在热情肯定我的文章、观点之后,语重心长地说:“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要考虑后果与影响,措词要好好斟酌,不要使别人读了不舒服。”他的话非常正确,是针对《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而发的。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畅快的率性文章,真正做到怎么想就怎么写。一个乡村教师,指点江山,旁若无人,着实得罪了不少

^① 详见拙稿《地圆——“天圆地方”考》,载饶宗颐主编、李学勤执编的《华学》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人,他们的激怒也在情理之中。我后来写文章常想到黎澍同志的这些话,尽量考虑后果,但又很难完全做到。例如这篇自序,我有意要写得自由自在一些。因为演员也有卸妆的时候。人生在世,总不能老是像拍照时候那么拘谨,尤其是进入晚年以后,总不能把憋在肚子里的真心话都带到火葬场去。

据说,人的性格与肠子有关。我照过胃镜与肠镜,大多数人照肠镜都比照胃镜难受得多,因为肠子弯弯曲曲,而我觉得还是照肠镜舒服,医生说因为我的肠子比较直。我说话写文章都是直来直去,不善于转弯抹角,更不会观颜察色,见风使舵。这是我的致命伤,为此吃了不少亏。我自知有这个缺点,所以埋头读书做学问,以为学术界是一片净土,可以怎么想就怎么写,事实却不尽如此,那些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学科尤非如此。

1983年春,国内有过一阵“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运动一开始,北京有老同志点了我的名,批判我的农民战争观点。消息传到浙江,颇有“风雨欲来”之势,幸好我的所在单位领导人沈善洪、魏桥、王凤贤、胡国枢等同志,以“学术问题”为由,顶住了“风雨”的袭击,使我能够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历史毕竟已进入新的时期,运动很快就不了了之。否则,单位领导是招架不住的,甚至会引火烧身。运动虽然流产了,对我的影响却依然存在。从此以后,我的农战史论文发不了,申请这方面的课题批不准了。

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提出新观点就要准备倾听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一直把不同观点的同志尊为诤友,他们的商榷,促使我思考得全面一些,深入一些,如果没有他们的商榷,我或许不会写得那么多。有些观点与我有所不同的学者,也视我为友。例如,徐祖根同志的商榷文章(本书附录第1篇)写得很平实,是同志式的平等讨论,后来我们在学术会议上相遇,情同故知。陈梧桐同志把他与我商榷的论文,先寄给我,再由我转给《浙江学刊》发表。苏双碧同志工作很忙,却给我写了很长很长的信,与我讨论问题,并推荐我参加1981年在西安召开的农民战争史讨论会。会议主持人孙达人同志对我也很友善,后来我发表了一篇与他商榷的文章(即本书第9篇),他并不介意,近年他调到杭州工作,与我友好相处。我与他们四人都做到争论不废友谊。1980年4月,我在北京期间,周良霄、张德信二位同志应《历史研究》编辑部之邀,来与我见面、座谈,我至今对他们还感铭未忘。

1981年在西安举行的会议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对我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引起许多与会同志的不满。我当时十分坦然,甚至有点高兴。因为理不够,拳来凑,人身攻击是心虚的表现,是自认理亏,自暴错误。回家

路上,我与楼学礼、梁赞英等四位先生畅游华山。在我一生游过的地方中,对华山印象最好,履险如夷,痛快无比。我当时48岁,陡峭的苍龙岭还能嗒嗒嗒嗒溜烟跳到底,四位同伴坐在岭头上看我表演。往事真如烟,我现在爬家里的楼梯都感到吃力了!

与我商榷的公开文章和会议发言,往往曲解我的原意,然后根据自己的曲解进行批评。这是过去常见的手法,毫不足怪。例如,白钢同志说:“董楚平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不再适用了。”(本书附录第185页)事情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广大读者来鉴定。为了使读者在鉴定真伪、判断是非时有一份客观真实的材料,本书对原稿的观点、措词,一字不改,即使现在认为某些提法不够确切,也悉依原貌,甚至连注解方式也不予统一,都按各篇初次发表时的样子排印,以致在这一本书里,夹注、页末注、篇末注都有。第13篇虽是未刊稿,这次收入本书,也丝毫不改,对于这一点,出版社编辑同志可以作证。当然,有些篇里个别明显的漏校误字非改不可,但都丝毫不影响原稿的观点。

其实,更重要的不是鉴别谁的观点如何如何,而是要划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盛行起来的、直接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服务的、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庸俗片面的“阶级观点”的界线。我相信,广大读者是能够划清这条界线的。正是这种庸俗的“阶级观点”,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一位史学理论家说,20年前史学界部分学者对我的“商榷”,是建国后曾经“长期享有正统地位”的“那种庸俗的、狭隘的、片面的‘阶级观点’”“处于‘强弩之末’、‘江河日下’状态中”的“猛烈批评和反复围攻”。(本书附录第210页)的确,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开过,历史已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就全国范围来说,那种庸俗的“阶级观点”的确已是强弩之末,但在农民战争史这个特定的学术领域里,那种“阶级观点”不但当时还是一张很强的弩,至今仍然很难说它已到了“末”日。农战史是“左”倾思潮最顽固的避难所之一。

农战史与现实的关系,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一切研究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现实生活的制约。白钢与我都是自觉的斗士,各为其“主”——为自己思想深处的“主义”而辩论,文章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谁也不必摆出纯学术的架势,指责对方“影射现实”。我是“明目张胆”宣称自己的农战史文章为拨乱反正服务,对现实生活中的“左”倾思潮与平均主义进行“明火执仗”的“攻击”,这是明“射”,而不是“影(暗)射”。白钢同志批评我搞“影射”,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影射”云云是过去大批判文章中出现频率极高、最为吓人的罪名,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它随即在文坛上绝迹。想不

到过了多年^①，突然频频出现于白文之中。它虽是陈腐武器，在历史新时期里拿出来使用却别有一种咸鱼翻身的新鲜感。但它不再有昔日的威风与杀伤力了，充其量只能作儿童玩具。白文云：“董楚平同志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第193页）这又是大批判时期“学术”论文中常见的泼妇式语言，历史新时期再使用它，只怕会伤及使用者的尊严。白文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恕我直言，整篇文章就是一条翻身的咸鱼。白钢同志是新时期十分走红的政治学家，运用大批判战术又十分娴熟，堪称全才，缺点是低估了时代的进步。

古为今用，乃古今通例，区别仅在于，有人为“今”而篡改“古”，有人在忠实于“古”的前提下为“今”服务。我们过去的农战史就是篡改历史、伪造历史、闭着眼睛说瞎话的突出例子。近年出版的《太平杂说》，举出太平天国研究中大量谎话，触目惊心，使你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②聊可自慰的是，我的反对者虽多，而且都是研究农战史的专家，但我至今还没有读到一篇指责我篡改史料来迁就自己观点的文章。

相反的，白钢同志这篇二万三千字的长文，居然全部由经典著作引文与自己对它们的任意发挥、再加上对我的“荒谬”观点的批判构成，全文没有举出一条（半条也没有）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白文分三节，第二节后部分说：“农民战争不是停滞不前的，它不断向前发展。前面我们从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民战争反对奴隶化倾向到明清以后农民战争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扫除障碍的叙述，也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本书第196页）可是，我查了白文的“前面”，又去查它的后面，反复翻查，怎么也找不到“生动”“叙述”，请广大读者也去找找看。历史学是靠史实说话的，史学工作者一旦摆脱史料的约束，那就失去根本，失去依据，天大的谎话都可以造得出来。

作为学术论文，白钢同志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条：一、“唯一动力论”是正确的；二、旧式农民战争的性质是“反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三、旧式农民战争的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四、“每次农民战争的结果，都为农民阶级的解放创造了新的条件，积累了新的物质手段。”这四条正是我们的农民战争史研究长期奉行的正统观点，本书第一部分的观点与它是针锋相对的，这里无须重复。20多年过去了，白钢同志的观点，仍在史学界占据领导地位，不同观点仍受到或明或暗的压制。这种观点的领导结果，是扼杀了农战史的研究生机，使它“病休”了20年，以兜售这种观点为己任的“中国农

^① 白文初载于1985年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3辑，又载于1993年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白钢著），前者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七年，后者十五年。

^② 《太平杂说》，潘旭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民战争史研究会”几乎“停业”了20年。与此相反,隔行学者写的《太平杂说》,凭史实说话,没有史学界的那些陈词滥调,不为这些陈词滥调而篡改历史,2000年初版就印了一万册,现在已经脱销,与贯彻史学界正统观点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形成鲜明对照。事实证明,群众不是不喜欢农战史,而是讨厌谎话。

《太平杂说》前言云:“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染,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即使有,受到种种‘关系’、利害的制约,很可能就欲说还休,胎死腹中。即使写了,圈内也很难让它正式露面。”这是经验之谈。看来,别的一些学科也需要隔行人去掺砂子。像农战史这种禁忌特严的学科,更需要“隔行人”的隔岸观火,他们的客观眼光往往能看到火场上的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会受到圈子内种种关系与利害的制约,说话可以自在得多。

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课题指南”,列有“中国古代农民与农民战争研究”,我兴冲冲地申报“农民战争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的课题。现在,我把自己当时写的“课题设计论证”一字不改地全文抄录如下: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农民战争曾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大热门,文化史是个冷门,当时甚至没有“文化史”这一“门”。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史成为大热门,而农民战争史研究从沸点迅速降到冰点。最近十多年,翻遍全国学术杂志,几乎找不到一篇研究农民战争的论文,更未见出版一本研究农民战争的专著,在中国史坛上,突然失去农民战争史这一“门”。农民战争史与文化史似乎在玩翘翘板游戏,两者似乎天生无法兼容。中国史坛的这种研究现状,显然不符合中国古代历史实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9年课题指南,列有“中国古代农民与农民战争研究”,是对这种研究现状的及时救弊措施。

中国是世界上农民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作用最为卓著的国家,许多次改朝换代都是由农民战争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农民战争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举世无双的。“文化热”的“文化”,或指“大文化”(包括物质、制度、精神诸层面),或指“小文化”(精神文化),无不受到农民战争的深刻影响。研究文化史,一字不涉农民战争,难免流于肤浅。此其一;其次,农民人数占中国古代总人口的90%以上,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史不研究农民思想,至少是片面的。

封建社会主要由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他们各有不同的阶级利益,必然有不同的思想;他们又有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与愿望,他们的思想有异又有同,即使是相异

的思想,也会影响对方,互相渗透。

同样是承受封建地租的剥削,中国农民与西欧农民、日本农民,各有特点。与西欧农民相比,中国农民的人身依附较轻,自由度较大,这是大家公认的。与日本农民相比,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较强。据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岛晋治说:“日本自古没有平均主义,更没有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事例。”德川时代的150年间,农民因反对额外附加的横征暴敛,向封建领主提出抗议1000多次,农民成群结队前往领主处表示抗议,请愿和裁决的过程是秩序井然的,大约半数的判决是有利于农民的,但是,农民领袖必须判处死刑:因为他们的动机虽然正确,而行动触犯了法律,农民也认为如此。农民们奔向刑场,凭吊自己的英雄,眼看着自己的英雄被处死,但不暴动,因为这是法律。事后他们为死者建立祠庙,把他们作为殉道者来礼敬。日本农民认为,领袖维护农民利益,但触犯了法律,他们既崇敬自己的英雄,又维护法律的尊严。这种两难处理,是中国农民无法忍受的。日本政府既要处死农民领袖,又容许农民为他们建立祠堂,这种两难处理,也是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

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中国的国君、家长,最担心的是百姓、子女们“不均”。“不均”就会“不安”,国家与家庭就可能“倾”覆。《礼记·礼运》篇把人人平等、个个无私的“大同”之世看成是人类的理想境界。从隋唐开始,中国政府对知识分子实行考卷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制度,这在古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有现象。在劳动人民中,秦末的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要求改朝换代,取而代之。平均主义是农民起义的思想酵母,中国古代平均主义思想特别发达,农民起义特别频繁,王朝不断更替,这些情况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尤为日本所无。

中国古代的均平思想为什么特别发达?孔子的均平思想与农民的均平思想有什么异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西汉初年的布衣王朝现象,有无思想联系?诸如此类问题,不但是农民战争史的重大问题,也是文化史的重大问题。但就谏陋所知,十多年的“文化热”,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些问题,过去的农民战争研究热潮,也没有科学地研究过这些问题。本课题的任务就是要正面研究这些重大问题,揭示农民战争与传统文化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填补农民战争史与文化史研究中的双重空白。

平均主义问题,只是农民战争与传统文化之间诸多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其它与

两者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从王莽开始,何休、苏洵、苏辙、张载、二程、黄宗羲、龚自珍等,为解决土地过分集中,缓和阶级矛盾,而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史不绝书,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热门而又棘手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殊问题。政治家、思想家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显然是胁于农民起义的压力。

总之,农民战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个大题目,对农民战争与文化史研究都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过去迄未认真研究,本人愿为探索这个大题目,填补这个双重空白而略尽绵薄。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古代的均平思想,研究年代从春秋晚期到鸦片战争前后,即从孔子到洪秀全。全书分上、下二编。上编作纵向(条状)研究,即研究从孔子到洪秀全,中国均平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下编作横向(块状)研究,即研究均平思想的若干专题:一、中国的“家文化”与均平思想的关系;二、各阶级均平思想的异同;三、均平思想在农民战争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与不同结果;四、农民战争与布衣王朝的关系;五、农民战争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六、农民战争对“大同”思想的影响;七、农民战争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影响;八、农民战争对“民本”思想的影响;九、《水浒》思想研究,等等。

本课题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已如上述。本课题的创新是填补农民战争史与文化史研究中的双重空白,把这两个貌似冰炭的课题归结一起。研究方法基本上采取归纳法,即重资料,少推理,尽可能用史料说明问题。

此外,本课题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解放以后,中国经济深受平均主义的祸害。拨乱反正以来,平均主义仍是贯彻邓小平理论的重大思想障碍之一。本课题重点研究历史上均平思想、平均主义的功过、得失,对消除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贯彻邓小平理论,必有裨益。

这次申请,以失败而告终。我与农战史的最后一次缘份就这样断了,年龄与身体条件也不允许我今后有投身农战史研究的可能。这本论文集是我与她的最后一次握别。朋友说,农战史是“左”倾思潮的重灾区,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晚年会有“无事一身轻”的快感。但愿如此!不过,我不是“薄倖”之人,我的心会永远挂着她。

在与农战史握别之际,想对它提点建议:今后的农战史研究最好从太平天国进行突破。因为它的资料特别丰富,容易把问题讲清楚,不像古代农战史,有时要在某几个字上大做文章,史不够,论来凑,随意性很大。本书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就是针对这种现象而写的。太平天国规模大,时间长,有制度,有纲领,把这只麻雀解剖好了,